

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批判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批判

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教研室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批判

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教研室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025 字数 145,000

1978年2月第1版 1978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74·386 定价: 0.53元

再版说明

放眼祖国万里河山，纵观世界革命风云，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当前，我们正处在“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伟大时代。喜看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而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危机更加频繁，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帝国主义同样是困难重重，内外交困，日子都很不好过，它们都面临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当然，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是不会自动消灭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他们的御用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各个领域里编造各种理论，为维护、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服务。资产阶级财政理论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一种理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和经济战线的重要任务之一。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所以必须批判，不仅是因为这种理论，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是流行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垄断资本服务，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科学的、反动的理论；而且还因为这种理论，特别是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还常常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或加以改头换面，来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服务。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谬论，究其实质，无非都是帝国主义阶段各种资产阶级理论的变种而已。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在其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过程中，在经济

5032.1.7
领域里也因袭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贬值货币等理论，来抵制、篡改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和党的经济政策，妄图制造混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然而，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现在，全国人民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深入揭批“四人帮”，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强大武器，继续努力作战，进一步揭露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把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作者在本书中着重批判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但考虑到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为了认识资产阶级财政理论的概貌及其变化，更好地揭露、批判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的反动实质，作者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历史顺序，把资产阶级财政理论分为英国古典学派财政理论、德国社会政策学派财政理论和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三大流派。先述评英国古典学派财政理论，其次批判德国社会政策学派财政理论，然后批判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

本书原出版于1960年。这次由原作者之一邓子基同志负责全书的重新修订，麦履康同志也参加了修订工作。

目 录

一 导言	1
二 关于英国古典学派的财政理论述评	12
(一) 英国古典学派财政理论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根源	12
(二) 英国古典学派的自由主义国家观和对国家经费 消极意义的论述	22
(三) 英国古典学派的租税理论	36
(四) 英国古典学派的公债理论	61
三 关于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批判	78
(一) 德国社会政策学派财政理论的时代背景	78
(二) 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国家观和国家支出理论	86
(三) 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租税理论	106
四 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理论及其批判	120
(一) 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 理论依据	120
(二) 国家干预经济是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点	128
(三) 扩大财政开支, 积极推行赤字财政政策	134
(四) 凯恩斯主义的公债理论	151
(五) 凯恩斯主义的租税理论	161
(六) 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	177
(七) 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的破产	185
五 结语	199

一 导 言

财政是人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产物。财政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并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财政始终同国家具有本质的联系，国家政权的存在决定财政的存在，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决定财政的性质。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里，不论那一种国家财政，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阶级专政国家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财政就是为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服务的。资产阶级为了确立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利用国家财政这一工具方面，就必然要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财政理论，来达到其目的。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制约。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相适应的。因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出于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目的的不同需要，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但其共同之点，则是自始至终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都是以资本积累为财政活动的中心，企图通过财政领域的种种措施为辅助来发展、巩固资本主义，来挽救资本主义，从而保证资产阶级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把反对封建制度以及封建的财政制度，特别是租税制度，作为消灭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手段。促进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财政是资产阶级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杠杆。原来，作为资产阶级向封

建制度作斗争的哲学而产生的自由主义,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已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和开展反封建斗争的武器。自由主义的发生、发展,必然在政治上导致议会政治,在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而资产阶级赋予国家的使命,在于维持使个人资本的活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秩序。这就是说,必须压缩国家权力,使资产阶级国家职能仅限于这一范围而不超越这一范围。与国家职能的这种限制相适应,财政的作用也必须有所限制。资产阶级及其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支出是非生产性的,主张把它缩减到最低限度。他们提出“最廉价的国家才是最良好的国家”的观点。这就充分说明他们对于国家财政具有消极的、消费的意义看法。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上,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写了《赋税论》,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反对英国封建国王的财政政策和税制,论证各种课税方法,提出尽可能减少公共经费的观点,奠定英国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的基础。但在英国古典学派中,要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财政理论为典型代表。他们从产业革命萌芽和实现的过程中,亲眼看到资产阶级的兴起并肯定了它所担负的经济使命,因而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和财政理论体系。

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充分地表现了他的以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为基础的经济思想。他要求扫除一切保护、限制的政策,确立“明白而简单的自然的自由主义”。他根据“自然的自由主义”,主张极端限制国家职能。在他看来,只有在筹措国家为完成其必要职能所需的经费中,才能构成财政。国家职能既在自由主义之下如此被压缩,那末国家的活动以及由国家活动所需要的经费筹措,也就被视为“必要的害恶”。亚当·

斯密在谈到租税原则时，仅限于阐述以所得为对象而征课的所谓平等原则，以及征课技术和财务行政上所应遵循的准则，至于以充实国家经费为前提的课税原则，则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亚当·斯密在论述租税四大原则之外，还谈到了随租税的征课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害处，以及应如何使税收减到最少限度。亚当·斯密还根据其生产概念，以物质财富的利用和增加为前提，认定政府的经费终归全部用于不生产的消费，认为公债是因某种用途而抽出的资本，因而对一国的资本积累是不利的。

大卫·李嘉图的财政理论同亚当·斯密的说法大体一致。他认为国家行为是不生产的，把政府行为所需要的经费看作是消费的，因而他也把尽量缩小政府行为范围和尽量减少租税负担，当作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凡是阻碍资本形成的租税，他都是反对的。李嘉图认为：“如果没有赋税，资本的这种增加还会更多得多。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①政府的经费既是不生产的，那末政府用募集公债的方法来筹措经费，就相应地削减了一国的生产资本。

英国古典学派的财政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发生、发展时期所需要采取的财政措施，是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的一种财政理论。古典学派的财政理论和它的经济理论一样，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切障碍，为它的前进开辟了道路。它是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在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已在历史发展中暴露无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8页。

之间的斗争日益采取了公开对抗的形式。从这时起，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就必须通过强化自身的权力来设法缓和矛盾或镇压反抗。资产阶级财政学中的所谓社会政策学派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这种社会政策曾特别盛行于德国，它的财政理论也特别被德国社会政策学派大加鼓吹，这是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使铁血宰相俾斯麦十分惊慌。为此，他在国内实行了以下列三点为依据的政策：第一是经济的，想要克服国内的产业萧条；第二是社会的，所谓要“救济”劳动人民；第三是政治的，要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他的这种政策的实质，无非是要镇压社会主义运动。俾斯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者或进步的学者实行镇压；一方面他又察觉到单是这样做对自身并非完全有利，所以又采取怀柔政策来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所谓社会保险立法，就是以“积极增进劳动者的幸福”为标榜而出现的。社会保险的经济效果对产业资本家大为有利：第一，这一措施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间接促进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增加劳动力的来源。为俾斯麦这种社会政策出谋献策的是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重要人物瓦格纳之流。瓦格纳之流的财政理论充分地体现了俾斯麦的意图，成为俾斯麦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策略。

作为反对自由主义的曼彻斯特派而出现的德国历史学派，一方面反对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对个人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另一方面扬言要改善劳动者的状况，容许劳动者有团结的权利，强调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协调一致。这种社会政策的经济理论与财政理论，无疑已把亚当·斯密所曾深切注意过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两者之间的界

限,被在所谓“文化”、“历史”、“人类进化”、“人类精神生活”等等名义下撤除了。他们否认经济规律的存在,甚至以道德目的、法规等等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空谈来代替经济研究,理论思维让位于政策思维。尽管他们奢言所谓要改善劳动者状况,但在实质上却在坚决反对社会主义。1873年,他们几乎网罗了德国所有“著名的经济学家”,组成社会政策学会,即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结成一种政治实力。作为俾斯麦的御用学者,瓦格纳要求在财政理论上容纳所谓社会政策的见解,认为国家的任务不要象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应该局限于法律目的的狭隘范围以内,而必须加强干预。国家应当“增加文化福利设施”,并对于“下等人民”的向上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支持”。他们特别企图利用租税来“矫正”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国民财产的分配,来“矫正”个人所得和个人财产的消费。他们高喊消除分配领域里的弊害来欺蒙广大劳动人民。

在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理论中,瓦格纳的财政理论是影响最广而蛊惑性最大的一个典型。瓦格纳的财政理论,不仅在德国直接的影响,而且使资本主义各国以及一般改良主义者也都受到广泛的影响。瓦格纳为成熟的和趋于腐朽的资本主义制造的财政理论,主要是为德国的容克贵族地主阶级和资本家利益服务的,也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它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固有的一切矛盾——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各个垄断集团、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都日益发展和尖锐化。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个极大的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的蓬勃发展,都促使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加深了资本主义总危机。在总危机时期,由市场问题尖锐化所造成的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经常的失业大军的存在,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殖民体系的瓦解,日益动摇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加强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而使他们日益贫困化,不断奴役、掠夺和转嫁危机于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不断实行侵略政策、挑起战争以及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这些虽然保证了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但又反过来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瓦解过程中矛盾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都发生很大的影响。

为了掩饰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和发生经济危机与失业现象的真正原因,为了替垄断资本集团在国内外实行反人民的政策作辩解,为了挽救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免于灭亡,于是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中的一种“新”理论也就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就是臭名远扬的所谓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的产物,是适应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而编造出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最反动的意识形态。

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从青年进入壮年时,正是大英帝国从黄金时代进入衰落时代。他亲自目睹“和平繁荣”的毁灭,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特别是1921年的经济危机,1929—1933年空前深刻化的世界经济危机,和1933—1936年的“特种萧条”阶段)更加恶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中失业现象日趋严重。凯恩斯知道,他所处的时代正

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时代。但是，出于他的阶级本性和维护他那个阶级利益的需要，从资产阶级的剥削哲学出发，想乞助于经济手段以至财政手段来更“聪明地”“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更“有效地”弥补资本主义的“缺点”，更“现实地”医治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特别是想利用国家和国家财政来挽救资本主义经济。他不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极端腐朽的种种现象，都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破产的标志，他还企图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和“干预”，把资本主义引进所谓“有调节的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凯恩斯在1933年发表的《走向繁荣之路》一书中提出了他挽救资本主义的方法，认为增加通货，降低利率，增加社会支出（特别是增加政府支出，如举办“公共工程”之类），是走向繁荣的主要步骤。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以“就业和危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以及为“就业和危机”理论服务的财政理论。他在书里否定了古典学派关于极端限制国家职能和政府支出的非生产性等主张，再三强调要加强国家的干预和扩大政府的职能，要由国家通过租税、公债、利息率政策以及其他手段来调整消费倾向，要用通货膨胀、降低工资、降低利率与扩大预算的办法来增加公私投资。他认为，把某些调节职能交给国家，不会引起资本主义的灭亡，反之，会保存和巩固资本主义；硬说资产阶级国家有能力“调节”和“组织”经济生活，防止经济危机和消灭失业。同时，把国家支出看作是“刺激”需求的手段和生产增长的推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甚至把赤字预算也视为国家经济繁荣所必需。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支出的

任何削减只能造成悲惨的结果，而预算平衡的观念应列入陈腐的经济范畴之内。

凯恩斯首创了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而凯恩斯的门徒如美国汉森、萨缪尔逊之流则进一步发展了凯恩斯的荒谬论点。凯恩斯认为，大量公共支出的刺激，足以迫使工业“抽水机”的开放，从而导致彻底的经济繁荣，以及私人企业的扩大。在实行“抽水机”开放政策的初期，不会有人对预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自行平衡发生疑问，因为在经济繁荣之后，政府收入可以大大增加，国家支出可以逐渐减少。

汉森把国家财政当作“调节”经济、消除危机，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决定性手段。他认为扩大政府支出（或扩大公共投资），可以创造效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可以克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按指危机）与经常性失业。汉森把国家支出说得十分神妙，编造出一套所谓“补偿性财政政策”。据汉森的说法，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必须在经济萧条或危机时期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公共投资，实行赤字财政政策；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则减少、压缩政府支出，取得预算盈余，实行紧缩财政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在萧条时期不要求预算平衡，“繁荣”时期可以要求预算平衡。他们认为，由于截长补短，以盈补亏，虽然不能做到逐年预算平衡，至少在整个经济周期内，可以做到预算平衡。因此，对一时出现的大量赤字不必大惊小怪。汉森认为，这种“补偿性财政政策”并非是只能医治经济危机的片面的膨胀性政策，而且还是一个足以“熨平”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和彻底“消灭”经济危机的“全面性”方案。他硬说，实行这种方案，不仅可以在萧条或危机时期利用膨胀性财政政策恢复繁荣，而且还可以在达到“充分就业”后出现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可以防止经济危机的爆发，从而可以保持

资本主义的“长久的稳定”。这种说教，为战后美帝国主义国家等扩大财政赤字提供了理论依据。

萨缪尔逊认为，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就能够扩大全部需求，就能够增加国民收入，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解决失业问题。他胡说什么美国的失业问题“不是用石头，而是用冰块所构成的”，当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扩大全部需求的时候，“冰块便会随之而溶化”。这种说法和比喻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凯恩斯主义者既然把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作为“消除”经济危机、达到“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那末财政收入来源就不得不乞灵于租税与公债。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可以用增加租税来保证扩大财政支出的需要，弥补财政赤字，还可以使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均衡，即用租税作为调整国民收入的方法，以消除财富不公平的现象。他们认为，在萧条或危机时期，也可以适当减税、“加速折旧”，以刺激私人企业投资和经济的恢复。这种说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租税保证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掩盖资本主义租税制度把全部负担放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肩上的剥削实质，他们不是为了减轻租税，也不是为了财富的公平合理分配，更不是为了加重资本家的税负和限制他们的利润，尤其不是为了减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租税负担。

凯恩斯主义者还把增发公债说得天花乱坠。汉森说：“政府继续增借公债，以公共支出的方式来解决长期失业问题，实在是一种保守性的建议。”他把公债的增长说成是增进全国福利的手段，是“实现公共政策的工具”，是“一项统制国民收入的方法”，是全国处于幸福的象征。在他看来，公债“如与租税机构相配合，可以用来管理所得的分配”。^①他还认为，国内

^① 汉森：《财政政策和商业循环》，1941年英文版第181、185页。

公债并不具有任何私人债务的特征，甚至不应该把它称为债务。他从公债只是一种货币所得的转移而非真正债务的理论出发，认为对于公债的继续增加可以不必有所顾虑，公债的继续增加可以作为实现“充分就业”和促使经济繁荣的重要工具。汉森并不打算在公债用途及其效果上取得债务费用的补偿，却又乞助于租税的增征与提高税率。这样，所谓公共支出的筹措，最后仍然不得不全落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萨缪尔逊也说什么公债是“我们自己欠自己的东西”，“是一种单纯的‘记账手续’而已”，“是一种虚假的金融财富”，因此，“公债并不象石块那样压在国家的肩头，使它的国民承受石块的负担”。^①这简直是欺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胡诌。

凯恩斯主义者为了扩大政府支出、弥补预算赤字，还乞灵于通货膨胀。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使赤字财政政策产生“积极效果”的必要条件。这是进一步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进攻。

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把政府支出投于军事企业，投于战争，为侵略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辩护，并且公开鼓吹战争。凯恩斯本人说：“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战事等天灾人祸，都可以增加财富。”^②他甚至赤裸裸地说，象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是保证“充分就业”的唯一可能办法，战争是政治家认为大量举债支出的唯一正当用途。这样，凯恩斯把煽动战争也成为他的财政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见，凯恩斯主义的财政理论是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服务的，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

① 萨缪尔逊：《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0—271页。

②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9—110页。

正因为如此，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把凯恩斯斥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正因为如此，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一出笼就被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御用经济学家视为至宝，捧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秘方，称为反对古典学派（正统派）的“新正统派”，认为是“凯恩斯革命”，进入了“凯恩斯时代”。四十年来，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他们都主张采用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制定财政政策来作为“反危机”的有力措施。四十年来，在美国，从1935年罗斯福实行“新政”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经杜鲁门标榜的所谓“善政”，杜鲁门、肯尼迪的扩张侵略和实现所谓“伟大社会”，尼克松的所谓“充分就业预算”、“新的经济政策”和“尼克松革命”，以及福特的“反危机”措施等，无非都是根据凯恩斯主义财政经济理论来制定与执行的。

实践一再证明，凯恩斯主义财政经济理论不是科学的，反动的，因为它不可能也不敢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必然要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和帝国主义的日趋没落而破产；而且据它而制定的财政政策，也并没有在“反危机”中发挥消除危机、解决失业和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相反，却使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无法解脱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御用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财政理论已经失灵了；认为凯恩斯的财政理论“进入了第二次危机”，“凯恩斯革命”和“凯恩斯主义”“崩溃了”，“凯恩斯的办法反害了自己”。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再也找不到什么“灵丹妙药”了。